

高等教育面临的挑战与应答

——海峡两岸大学教育学术研讨会综述

邬 大 光

提 要 海峡两岸大学教育学术研讨会于1998年元月在厦门大学召开。两岸与会学者从迎接21世纪的挑战出发,围绕“21世纪大学教育发展趋势”、“大学教育经费筹措”、“传统文化与大学教育改革”、“大学生的素质教育与通识教育”、“大学教学改革”、“大学招生考试改革”、“大学教育质量控制与评估”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关键词 大学教育 学术会议综述

作 者 邬大光,厦门大学高教研究所教授,博士

在即将步入新世纪之际,把一个什么样的高等教育带入21世纪?日前在厦门大学召开的“两岸大学教育学术研讨会”,来自海峡两岸的学者就这一共同关心的时代命题进行了探讨。

一、高等教育面临的挑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高等教育经历了发展的“黄金时代”,高等教育民主化、大众化的观念传播以及由此引发的高等教育数量上的扩展,带来了高等教育观念及体制上的若干变革。与此同时,后工业化社会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以及各国政府对高等教育资助能力的下降,导致了世界范围内不同程度的高等教育危机,诸如经费危机、道德危机、质量危机等。厦门大学校长林祖赓教授认为,从国际范围来看,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们主要面临3个方面的重大挑战:一是冷战结束,世界正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国际竞争的实质转为以经济和科技实力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较量。与此同时,人类也面临着生态破坏、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等共同危机,“可持续发展”被日益重视。二是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周期越来越短,以信息化为

主要特征的新的产业革命,正在使世界经济从工业化阶段过渡到信息化阶段。“知识经济社会”的迅速到来,将对人类的生产、生活、精神、文化产生全面而深刻的影响。三是基于人类最新科技和知识的经济形态即智力经济(或称知识经济)已经形成,并将在21世纪显示出强大的生机。今后技术密集型产业中占主导地位的资源和生产要素既不是资本,也不是土地或劳动力,而是知识;仅仅依靠提高体力劳动强度来提高生产率的历史将成为过去,取而代之的将是非体力劳动的生产率,科技、知识提供的生产力将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和关键因素。

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谈松华研究员认为,世纪之交,中国高等教育将进入第二个百年,影响高等教育发展的各种因素正发生深刻的变化。其一,我国社会转型和体制转轨将引发制度性变革。它不仅涉及教育体制和运行机制的变革,而且将触及教育思想、教育结构、教育体系、人才培养模式等整体性变革和制度创新。其二,经济、科技的全球化进程,要求中国高等教育面向世界,摆脱狭隘眼界和封闭模式,主动参与经济科技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的过程,从而实现教育的国际化。其三,未来社会知识化、信息化的发展趋势,必将更新高等教育的功能、目标和组织机构。中国高等教育必须对知识经

济、知识社会时代的到来做好人才和教育上的准备。

台湾交通大学戴晓霞副教授认为,市场化是主导新世纪高等教育发展最主要的力量之一,高等教育市场化能够促使高等教育的供应与需求趋向于完全竞争市场,亦即透过市场力量的运作消除垄断、刺激竞争,提升高等教育的生产效率及社会资源的分配效率。在一个需求多元、竞争激烈的教育市场里,大学的管理者若不能运用行销理念先对组织的目标、消费者的需求、组织的相对优势、组织可能采取的策略等方面做彻底的研究,当政府收起保护伞之后,或许连沦为市场附庸的机会都没有,只能被市场的浪潮所淹没。因此,高等教育应该加速市场化的进程。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教育部门首先要减少对公立大学各方面的管理,以市场力量取代政府干预,赋予高等教育机构更大的管理弹性。其次,政府应该放松或取消那些禁止私立大学和公立大学竞争的规定,即取消垄断,促进公立大学和私立大学能在一个更平等的基础上竞争。第三,提倡高等教育私立化,即允许原为政府管理的学术机构独立运作。与此同时,她分析了高等教育市场化可能带来的弊端。在高等教育领域,大学、政府、消费者一直是三者并存的,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动态的,市场化的趋势主要是指政府在其所发挥的功能方面做了某些调整,由以往高等教育的支持者、甚至是高等教育供应者的角色,转而支持高等教育的消费者,甚至在“准市场”中充当消费者的代理。即使强调消费者导向的高等教育,也同时要考虑高等教育的特定功能,教育理念及人力资源,透过“产品导向”及“生产导向”,充分考虑高等教育消费者的需求状态。

台湾暨南国际大学校长袁颂西教授、比较教育研究所所长杨深坑教授从现代科技发展的维度,论述了科学技术对大学教育的冲击。他们认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将从两个方面对大学教育提出挑战:一是大学与政府及社会之间的关系须重新调整,二是大学本身的功能及内部组织结构需要改革。在高科技化的后现代社会,效用逻辑和商品逻辑正在成为主导着整个社会的重要力量,虽然政府已无法扮演完全规划、分配资源、强力干涉的角色,但决不能放弃应尽的责任,政府更有责任善于运用新科技,调整大学与产业界的关系,使得社会能以最经济有效的方式,获得整体均衡的发展。在发展科技的同时,政府更应以经费调整的方式,补助文科系,提振人文精神,使得整个社会不致步入“唯利是图”、“上下交征利”的社会。与此同时,大学为了避免现代科学技术

中某些天然性的弊端,要强化通识教育,特别是新科技通识教育,使学生能以更宏观的见识,开阔的心胸,来面对未来高科技发展,提升生活境界。

两岸学者普遍认为,21 世纪的这些挑战,将从根本上改变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工作方式、学习方式及思维方式,也无疑对高等教育提出了新的任务和要求。随着祖国大陆改革开放的不断发展,经济体制改革的日益深入,高等教育体系与市场经济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不相适应,迫切要求高等教育从办学管理体制、内部管理体制、队伍建设、人才培养模式等方面作出相应的、更为深刻的变革。

厦门大学潘懋元教授认为,21 世纪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必须有新的教育观念来指导。可持续发展作为世界范围内出现的一种新的发展理念,对高等教育的发展有理论和实践上的指导意义。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应当作为高等教育的发展观。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方方面面的问题,从发展战略、培养目标、专业设置到教学内容、课程体系、教学方法、教学管理,都可以从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与原则开辟新的思路,获得新的认识。高等教育既要为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战略服务,又要根据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与原则进行改革,它可以使高等教育的发展更加注重长远利益和精神价值。

上海师范大学校长杨德广教授认为,迎接挑战的关键是转变教育观念。具体来讲,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第一,从按政府和计划办学为主向按社会和市场需要办学为主转变;高等学校要深入社会和市场,不能再像以前那样脱离社会关门办学。第二,从依赖型向自我发展型转变,高校要充分利用自身的力量,到社会大市场中去求生存、求发展。第三,从单一的事业型向事业、产业型相结合转变,大学要建立教育市场,包括知识市场、信息市场、科技市场、人才市场。第四,从义务型教育向非义务教育型转变,不应再把高等教育作为义务教育,对重点大学和热门专业的收费标准可适当提高。第五,从单一的公有制办学体制向公办与民办相结合的多种办学体制转变,即以公办为主,允许民办、私立、中外合作办学等多种体制并存,实现办学主体多元化,以调动各方面的办学积极性。第六,从以专业教育为轴心向以素质教育为轴心转变,在培养目标上要立足于成“人”的教育和素质教育,克服教育的功利主义倾向。

华中理工大学杨叔子教授从我国优秀的教育传统“下学上达、文质相宜”的思想出发,提出了大陆理工科高等教育中“五重五轻”的弊端,即重理工、轻人

文,重专业、轻基础,重书本、轻实践,重共性、轻个性,重功利、轻素质。集中探讨了知识如何转化为能力、素质,展开了对岳麓书院的“博于学问,明于睿思,笃于务实,志于成人”这一教育传统所表达的学习、思考、实践三者造就人才中的作用。明确提出了高素质是知识与能力的定向器、放大器,有知识、有能力,绝对不等于有高素质;没有知识,没有能力,绝对不会有高素质。两个方面相辅相成。今天所讲的素质,主要应体现为道德方面的素质,是做人,是爱国方面的素质。华侨大学吴承业教授对素质教育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中、小学是完全的素质教育,属于认识性和养成性的素质教育。而大学的素质教育,是具有修养性和责任性的素质教育。大学教育与中、小学教育之差异,绝不仅在于基础教育与专业教育之别,大学教育不是单纯的职业训练,而是属于成才教育。大学具有承担素质教育的任务。大学素质教育的内容包罗万象,但其核心是能力的培养。

台湾花莲师范学院校长陈伯璋教授认为,通识教育是博雅教育在现代社会的发展,是一种指导大学教育的理念。通识教育不是专门或专业教育,而是一种培养学生“经验整合”与“整全判断能力”的教育方式。通识教育不是个别知识或零碎经验的拥有,而是一种统整的知识论,圆融人生价值“承诺”的价值论,以及批判反省的思考模式或方法论。通识教育是一种系统知识的建立,同时也是健全人格的陶冶;它不该只视为正式课程或学分,而需要“潜在课程”的配合;它必须透过具有通识素养教师的努力、良好的师生关系和相互激励的学习互动,来实现“转识为智”的通识教育的目标。

二、关于大学教学改革

大学教学改革成为此次研讨会的一个热点,许多学者从迎接21世纪挑战的高度,论述了现代大学教学改革的重要性。普遍感到,高等教育正在由数量上的扩展转向质量提高的阶段,教学改革是保证高质量教学的关键。

清华大学教务长袁德宁教授认为,推进大学教学改革,要以更新教育思想观念为先导,大学人才培养模式要作相应改革。他指出,重点大学人才模式的改革要解决好4方面的问题。即要提升人才的社会责任层次,注重决策和观念技能的培养;专业面要扩大,专业要由对口性向适应性转变,实行宽口径的

专业教育;加强学生综合素质的养成;更新工程教育观念,把单一专业化的教学体系改变为兼容专业、人文、经济、管理和环境等内容的综合教学体系。课程改革要注意处理微观与宏观的关系,局部与整体的关系,基础性和非基础性的关系,专业与非专业的关系。当前,更需要关注“非工程”素质的养成,这个问题既是时代的要求,又是目前教育的缺陷,要建立“大工程”的教育观念。

华中理工大学文辅相教授,探讨了社会信息化趋势下的大学教学内容与方法的改革。他认为,大学应对信息化社会的基本战略是:加强教学内容的基础性,提高教学内容的起点,以知识的质的提高来应对知识的量的增加;拓宽学科的面向,注视知识的前沿,以扩大学生的眼界,提高学生驾驭知识的能力;活化教学方法,发展学生的个性,以激励学生的思维与创新。

华南理工大学杨晓西教授从世界科技教育的发展趋势,阐述了大学教学改革的走向。他认为,科学技术的不断突破,要求大学的教学要有新突破。这主要体现在,其一,大学教学内容的改革,要注意各门学科中现代信息技术内容的掌握,一定要跟上时代的发展;其二,教学技术手段必须大面积地应用现代信息技术,要从“手工”中解放出来。因此,大学教学改革要着重树立3种观念,即创新能力培养的观念、终身教育的观念、培养学生基本学习能力的观念。

厦门大学郑学檬教授从大学的培养目标入手,提出了教学改革的见解。他认为,大学培养目标固然应该体现“通才”观念,但这只能是一个原则判断,不宜统一化、固定化,可随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和学校类型确定其具体要求。课程设置应注意“宽口径”与“厚基础”的矛盾,宜少而精,集中在基本的专业基础课程与专业课程上。加强教学支撑系统的建设,推进教学手段现代化。

三、高等教育体制改革

由于大陆与台湾在大学体制上有颇多相似之处,大陆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进展与走向引起了台湾学者的极大兴趣。

上海教科院胡瑞文院长指出,我国教育领域面临的基本矛盾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社会经济发展与人民群众对教育日益增长的需求同教育供给力严重不足的矛盾;二是教育事业自身发展的需求

与教育资源供给严重短缺的矛盾。造成上述矛盾的原因之一是教育体制改革严重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为了解决我国教育的基本矛盾,在世纪之交要大力推进高等教育的办学体制和投资体制改革。改革单一的政府办学体制,大力发展多元化的非政府办学形式;各类民办高校原则上自收自支,按不同办学条件和教育运行成本,核定分类收取学费的标准;高等教育都应实行受教育者与政府共同分担教育成本的制度,最终承认和逐步开放选择性教育市场。

厦门大学邬大光教授从高等教育办学体制、管理体制、投资体制的相关性,阐述了办学体制是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重点。他认为,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真正指向应该是办学体制改革,这种办学体制改革绝不仅仅是在不同业务部门、不同层次政府间的管理权的更换,其主要目的是唤起全社会对高等教育的关注,唤起多样化的办学体制。办学主体的多样化,将直接导致投资渠道的多样化。我国高等教育投资长期不足,与办学主体单一有直接的关系。在多样化的办学模式中,私立高等教育应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这是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成功经验。

华东师范大学赵中健副教授从世界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发展趋势,分析了私立高等教育是实现“大众化”目标的主要方式。在此基础上,他提出我国发展私立高等教育的较好途径是创办附属于公立大学的民办学院,由公立大学保证学院提供课程之质量,为附属学院的学生组织考试,并向合格毕业生授予大学的学历。为了保证附属民办学院的教育质量,拥有这类学院的大学首先应该是重点大学。对最好的大学给予最好的发展机会,对最好的大学给予最大的发展自由。

华东师范大学谢安邦教授从大学内部的权力结构调整的角度,探讨了大学内部的管理体制改革。他认为,现在大陆高校内部的权利结构不尽合理,这使得高校的管理职能不能充分有效地发挥作用。因此,高校的权力结构应该调整,实现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适当分离的原则,权力中心适当下移,扩大学院和系的自主权,以学术权力的下放为主,行政权力下放为辅;同时,要使权力适当分散,体现高校管理民主化的特征,提高决策的可行性。

四、传统文化和高等教育改革

共同的文化传统,使得两岸学者对传统文化

与高等教育的关系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两岸学者认为,要承担起弘扬和创造新文化的使命,让东方文化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同时,大学应该在弘扬和创新方面走在社会的前列,促进和沟通中西文化的交流。

台湾政治大学沈清松教授认为,中国传统文化重在“讲理”,而西方现代文化重在理性。所谓“讲理”,表现在重视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及其整体性;所谓“理性”,则主要表现在现代西方的自然科学和技术的研究之中,重在解释成功与有效。现代社会的发展已经为东西文化的融合创造了条件,这就是两方面之间的动态张力与互动。一方面是现代科技促成的普及化、全球化的进程,另一方面是历史的觉醒,导致对每一文化传统的独特性及对生命意义的关怀。但实际上,科学当中有理性,科技亦为文化的一环;科学属文化中的认知系统,技术属文化中的行动系统,两者的结合密不可分。因此,从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化角度而言,大学改革,既要注意自觉的科学教育,又要对各部门科学发展进行社会、历史、哲学等方面的反省,要在整体社会文化中对科学与技术的发展进行定位。这就要求科学和技术的教育必须与人文和社会科学的教育相平衡,因为人文学科在本质上是历史性的。实现东方文化传统与西方现代文化在大学中合适的结合方式,就要对文化进行开放和比较,两种文化的可理解性依然存在。

陕西师范大学李钟善教授认为,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历来都是教育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高等教育改革必须继承和发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同时借鉴国外有益的文化经验。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把它的过去完全加以否定,那么这个国家、民族就很难生存和发展;而如果完全拒绝外来文化,其发展同样也很难创新、持续。提倡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和加快实现国家现代化,应该是对已往传统优秀文化的继承和弘扬,又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再创造。

北京师范大学郭齐家教授从儒家“安身立命”之说,探讨了现代大学的培养目标。他认为,现代大学教育的发展,是全力培养道德与才干兼顾的新人才,其实质就是仁者与智者合体的人才。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安身立命”之说,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层内涵,当今大学生应该把这一观念根植于深层的心理结构之中,自觉地接受本民族的文化熏陶。而作为大学教育工作者,也应该以振兴民族传统文化为己任,教会学生树立“安身立命”的思想观念,帮助他们努力提高精神境界。中国传统文化重视道德伦理

与人文理性,其终极目的是培养民族精神,淳化现代人风,提高人的生命素质,达到一种真善美统一的心灵境界。

五、台湾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

来自台湾的15名学者,向大陆同行介绍了近年来台湾地区高等教育改革的过程及未来的构想,引起了大陆同行的关注。

台湾暨南国际大学杨莹教授介绍台湾地区近年来大学教育发展的重要特征可归纳为3个趋势。其一,受到“教育松绑”观念的冲击,大学教育的行政体系、内部组织结构及运作开始转变。其二,为减少升学主义的影响,大学入学政策及文凭发放开始向弹性、多元化方向发展。其三,为解决政府财政紧缩的困境,并有效运用教育资源,大学教育资源的分配方式开始进行调整。在总体上,台湾地区的大学教育已有朝向弹性化、多元化、自主化、普及化、效率化转变的趋势。在大学教育目标与功能的定位问题上,台湾地区教改会的建议指出,高等教育学府的类型与功能应包括:各种不同功能之大学,其功能或以教学或以研究为主;技术学院,其功能以专业技术教育为主;社区学院,其功能包括教学、技术职业教育、服务等;专科学校,其功能以职业技能的教学为主;开放大学,其功能以进行成人教育为主。高等教育的功能,除了教学、科研、服务三大功能之外,应提倡社会批判与提供平等的教育机会两项功能,即“大学本身应秉持自我反省、批判与创新的态度,富有理想主义色彩,针对社会上不合理、不公平的种种现象,进行批判与改造”。

台湾杨国赐教授指出,未来台湾地区高等教育的发展,将面临重大的转型,包括高等教育的理念、管理的型态、制度的变革等都将遭遇重大的挑战与变革。在迈向21世纪之际,台湾地区高等教育应保持4大特色:(1)多元化的高等教育:包括学生、入学方式、课程、学制以及学校定位的多元化;(2)自主化的高等教育:包括大学的自主、市场机能的调节、学习选择空间扩大以及教育资源分配合理化4方面的自主;(3)国际化的高等教育:包括大学经营国际化、大学品质国际化以及国际人才培育;(4)社区化的高等教育:包括建设合作有效与推广教育的普遍实施两方面而达成。同时,台湾地区的高等教育为适应新的形势,在改革的策略上应该做到:制定高等教育长期发展计划,以促进整体建设;加强与调整高级人

力培育的规划;建立多元弹性的教育体系;合理分配教育资源;提升大学教育品质,适应国际化社会竞争的需求;促成大学自主,建立大学运作的规范;加强大学与社会的互动。

台湾中正大学王如哲副教授介绍了台湾地区高等教育经费分配及其效果的情况,并论述了台湾高等教育财政的变革方向。台湾的高等教育财政过去主要采用公务预算制度,具体运作方式是条列项目预算法,并且属无条件的公共经费补助模式,而且是政府直接监督的行政运作方式。从1996年开始,台湾开始实施“校务基金制度”,即第一年预算中政府拨款为80%,自筹经费为20%,以后自筹比例将逐年提高。这是台湾高等教育财政制度的一大变革。台湾之所以实施“校务基金制度”,一方面是为了鼓励公立大学开源节流,重视经营绩效;另一方面是赋予大学更大的财务自主性,减少受到公务预算制度的限制。为了以财政作为杠杆,调整公、私立大学之间的差距,台湾开始逐年增加对私立大学的经费补助,并且缩短公、私立大学学费的差距,以建立更为公平合理的公、私立高等教育平衡发展体系。同时,台湾教育管理部门为了调节私立大学学生必须缴纳较高学费的事实,已开始研究以发放“教育券”来协助学生缴纳学费。

台湾东吴大学校长刘源俊教授介绍了台湾地区大学入学制度改革的情况。台湾从1954年开始实行大学联合招生制度,联考是最主要的入学形式。但是,从90年代开始,各种新的招生方式开始实行或试行,形成多元的局面。主要是1992年“大学入学考试中心”提出“入学多元入学案”,其一是建议借鉴日本的“推荐甄选”制度,照顾有特殊意愿性向的学生,采取“高中推荐委员会推荐,大学甄选委员会甄选”的方式,一方面让大学可以招收合适的学生,另一方面也维持公平与公信。此一新的入学制度从1994年开始实行。其具体做法是规定学生只报一所大学,然后让学生参加2月份由大学入学考试中心主持的“学科能力测验”,依学校的要求予以筛选,学校再用自己的方式对筛选合格的学生作第二阶段的甄选,然后录取。其二是继续实行“优秀生保送”制度,并尽可能做到“推荐甄选”与“优秀生保送”制度的整合。其三是从1997年开始提倡“大学申请入学”,1998年大学申请入学共核定21所大学612个试办名额。总之,在“教育改革”的口号下,台湾的大学入学制度正经历剧烈的变化,其改革的基本原则是渐进、包容、兼顾。